

2004年第3期
(总第119期)

南洋问题研究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No.3 2004
General No.119

闽南文化与漳州月港的兴衰

李金明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16 世纪后期, 福建漳州月港从一个偏僻的海滨村落崛起为中外闻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然经历了短暂的 65 年之后, 又匆匆地退出历史舞台。有关漳州月港兴衰的原因, 学术界众说纷纭, 本文从闽南文化的角度, 论述了闽南人独特的海洋文化与漳州月港兴衰的有机联系。

关键词: 闽南文化; 漳州月港; 兴衰原因

中图分类号: F5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 (2004) 03-0075-07

隆庆元年 (1567 年), 明朝政府在倭患基本平定的前提下, 宣布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部分开放海禁, 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 缴纳饷税, 出洋到海外贸易。月港从此由一个偏僻的海滨村落, 一跃而成为闻名中外的对外贸易港口。月港崛起的原因虽说是多方面, 但与闽南人特有的海洋文化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拟从闽南文化的角度, 对漳州月港的兴衰作一初步的论述。

—

闽南滨海, 山多田少, 人们素以贩海为生, 形成了一种粗犷的海洋文化, “利商舶, 轻远游”, “恬波涛而轻生死”。即使在明朝厉行海禁期间, 不少闽南人仍为窥厚利而敢冒杀头之险, 出海从事走私贸易。就以对日本贸易来说, 尽管明朝政府一再严禁, 但自嘉靖二十三年 (1544 年) 十二月至嘉靖二十六年 (1547 年) 三月的两年多里, 到日本从事走私贸易而为风漂到朝鲜, 并被解送回国的福建人就达千人以上 [1]。其中仅嘉靖二十三年 (1544 年) 十二月一次被解送回国的漳州人李王乞等就有 39 人 [2]。另据万历四十年 (1612 年) 兵部的估计, 当时往日本进行走私贸易的漳泉海商已达数万人之多 [3]。正如明朝人冯璋所言: “泉漳风俗, 嗜利通番。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 尚犹结党成风, 造船出海, 私相贸易, 恬无畏忌。” [4]

闽南人这种冒死犯禁出洋贸易的习俗, 在明代的漳州月港一带表现得更加突出。据

收稿日期: 2004 - 06 - 18

作者简介: 李金明 (1944 -), 男, 福建泉州人,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海澄县志》记述，其地“饶心计者，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盖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故民乐轻生，鼓柁相续，亦既习惯，谓生涯无踰此耳。”早在成化、弘治之际，月港就因走私盛行，“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敲响答，东北巨贾竞鹭争驰”，而被称为“小苏杭”。至正德年间，当地豪民又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5]。月港猖獗的走私活动很快就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他们开始在此偏僻的海隅设立防海机构，以镇压走私活动。嘉靖九年（1530年），福建巡抚都御史胡璉提议把巡海道移驻漳州以弹压之，在海沧设置安边馆，每年由各府派通判一员住割，半年一轮换，这就是月港防海机构的首次设置。然而，它并不能改变闽南人出海谋生的文化习俗，走私活动依然如故。于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为福建巡抚时，则上疏要求扩大行政建制，在月港设县以加强管理。他在《增设县治以安地方事》中写道：“福建漳州府龙溪县月港地方，僻处海隅，遥通夷岛，生聚蕃盛，万有余家。以下海为生涯，以通番为常事，方且崛强负固，租赋不供，健讼构争，经年不决。若不预为之所虑，成化外之风。该巡海副使柯乔建议设县，盖欲立官师，以寝奸宄之谋，敷治教，以挽奇袤之俗，甚为有见。”[6]而后来因走私活动有所收敛，地方亦较宁息，故知府卢璧又建议暂停设县之议。直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知府唐九德始顺应民意，提出割龙溪县一都至九都及二十八都五图，并漳浦县二十三都之九图，凑立一县。由军门汪道昆与巡按御史王宗载奏请朝廷批准，锡名为“海澄县”。是时百事草创，县治就设在月港桥头，以原八都防御寇乱筑起的土堡修葺之。至隆庆元年（1567年）县治修成后，经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奏请，明朝政府遂宣布在月港开放海禁。

明朝政府之所以选择在月港开禁，首先考虑的不是月港本地的条件如何，而是闽南人以海为生，非市舶无以助衣食的文化习俗。他们认为，倘若禁之过严，断了闽南人出海谋生之路，势必造成动乱，危及其封建统治。漳州名士张燮在《东西洋考》一书中就提到：“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傭，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其久潜踪于外者，既触网不敢归，又连结远夷，向导以入，漳之民始岁岁苦兵革矣。”[7]都司戴冲霄亦明确地指出：“漳泉强梁，狡猾之徒，货货通番，愈遏愈炽，不可胜防，不可胜杀。为倭向导者，官府系其家属，不敢生还，岁岁入寇，是外寇之来皆由内寇纠引之也。福建之乱何时已乎，福乱不已，浙直之患何时而靖乎。”[8]为了遏制这些乱源，不少明朝官员提议开海禁以疏通其道。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九月，原任福建巡抚谭纶在回籍守制之前，上疏陈“善后六事”，其中一事就是“宽海禁”。他写道：“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鱼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宜稍宽其法。”[9]明朝政府为维护其封建统治，不得不采纳官员们的提议，宣布在月港开禁，准许私人海外贸易商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只是禁压冬，禁越境，禁盗贩，以达到“有禁然不绝其贸易之路者，要以弭其穷蹙易乱之心”的目的。

二

月港开禁后，私人海外贸易随即迅速地发展起来。据漳籍御史周起元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我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剖鲙脍，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10]当时从月港出洋的商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11]这些商船绝大多数是涌向菲律宾，一方

面因马尼拉与漳州距离较近,大概仅需 10 - 15 天的航程;另一方面因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至马尼拉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载运来换取中国的丝绸,闽南海商就是在墨西哥银元的诱引下纷纷驶向马尼拉。据在 1596 - 1598 年任马尼拉总督的摩加(Antonio de Morga)说:“他们虽然没有一起来,但是组成商船队或战船队。他们一般在新历三月乘着季候风和晴朗天气成群结队地到来,到马尼拉的航程是 15 或 20 天,售卖他们的货物后,为了不使回程遇到危险,他们在五月底或六月初季候风改变前返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约翰·萨雷斯(John Saris)亦谈到:“开往马尼拉的帆船成群地从漳州出航,有时是 4 艘、5 艘、10 艘或更多在一起航行,好像是事先约好似的。”[12]

每年从漳州月港开往马尼拉的商船数到底有多少,这要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波动都比较大。据威廉·舒尔茨(W. L. Schurz)在《马尼拉大帆船》一书中的估计,从 20 艘到 60 艘不等,在 1574 年有 6 艘,1580 年有 40 - 50 艘,在 16 世纪后 30 至 40 年一般是这个数;在 1616 年仅有 7 艘,而在 1631 年却有 50 艘,5 年后有 30 艘。出现这种波动的原因,舒尔茨认为:“每年到达船数的多少是取决于马尼拉赢利买卖的机会,航程的安危,以及中国当地的情况。每当中国人了解到马尼拉缺乏银元时,这一年来的船只就会减少;在航程中有海盗的消息时,船可能不出港而误过季风期,特别是印度支那沿海长期有海盗的抢劫,倭寇出没于北吕宋,以及以台湾为基地的海盗的攻击,有时候来自葡萄牙或荷兰殖民者的威胁也很严重,当时他们均集中全力以削弱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贸易;最后是中国国内的纷争或者沿海各省地方的动乱,也可能暂时中断到菲律宾的帆船贸易。”[13] 上述诸因素虽然会影响到中菲贸易的发展,但是,月港开禁后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却与闽南人独特的海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闽南人善于航海,勇于冒险,具有出远洋经商的文化特质。闽南人因以海为田,视渊若陵,久而成为习惯,故在明代东南沿海一带,善操舟航海者,多数皆闽南人。嘉靖时参与平倭的赵文华曾说过:“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港,泉之晋江有安海,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14] 嘉靖十三年(1543 年),给事中陈侃奉命到琉球册封时,在其封舟上使用的长年数人,皆是漳州人。陈侃认为:“漳人以海为生,童而习之,至老不休,风涛之惊,见惯浑闲事耳。”[15] 在帆船时代,出洋贸易者必须具有冒险精神,他们涉重洋,冒风飚,惊涛骇浪,险恶莫可名状,全赖上苍保佑,数百人聚集在一艘商船上,“皆四方萍聚雾散之宾”,从中推一“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已资市物往”,在波峰浪谷中求生存。闽南人所具有的这种海洋文化特质,为月港开禁后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闽南人善于经商,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闽南一带虽不蓄蚕,但丝绸却闻名于外,他们往往将购买的湖丝染翠红后,运回来织之。据说闽南手艺人善于仿造,“百工技艺不能为天下先,敏而善仿,北土缙缣,西夷之毳罽,莫不能成。”[16] 故在明代,漳州的纱绢与饶州的磁器、湖州的丝绵、松江的棉布,并称为日本人所珍重的四种中国商品[17] 清人王昶在《闽游纪略》中也说过:“泉人自织丝,玄光若镜,先朝士大夫恒贵尚之,商贾贸丝者,大都为海航互市。”[18] 这些丝绸在月港开禁后,大量地贩运到马尼拉,然后再经由西班牙大帆船运往墨西哥等地。开始时,由于质量较差,墨西哥总督恩里克斯(Enriquez)对之评价极低,他说道:“我认为整个贸易都是徒劳,与其说是受益,不如说是有害,因为所有带来的都是非常粗劣的丝绸,其中大多数是草织物,有些是假花缎、扇子、瓷器和写字桌、油漆盒。”但是,闽南商人很快就学会了如何迎合他们对优质织物的需求,并巧妙地仿效流行的西班牙图案,做得极其像安达卢西亚花布,且略胜过它。因此,在美洲殖民地向西班牙丝绸发起了强烈竞争,

以致于在西班牙国内掀起了限制和禁止进口中国丝绸的强大运动。一些早期的马尼拉总督，如桑德（Sande）和达斯马里纳斯（Gomez Perez Dasmarinas），以及墨西哥总督，如维拉曼里奎（Villamanrique）都提出，中国丝绸对宗主国的工业和贸易均起到实质性和危机性的威胁，且使帝国的大量白银流向中国。1592年，达斯马里纳斯（Dasmarinas）致信西班牙国王菲立普二世说，从东方进口到美洲的货物已超过从西班牙运来的货物。他强调指出：“这将妨碍陛下出口格拉纳达、穆尔西亚和瓦伦西亚丝绸所能获得的皇家税入。”[19]

至于到菲律宾贸易的闽南商人在经营上的敏锐，西班牙人也有描述。如博巴迪拉（Diego de Bobadilla）谈道：“这些中国商人是如此敏锐，假如今年某一种商品很畅销，明年他们就将运来一大堆。有一位因某种疾病而失去鼻子的西班牙人，请了一位中国人替他做了一个木头鼻子，以便能弥补他脸上的缺陷。这位中国人替他做的鼻子异常之好，这位西班牙人很高兴，慷慨地给了他20埃斯库多（escudo，葡萄牙及智利的货币单位）。这位中国人以为这钱太好赚了，第二年就载运了满满一船的木头鼻子到马尼拉。然而他大失所望，因为如要卖掉这些新货物，就必须把住在菲律宾的所有西班牙人的鼻子都割掉。”[20]当然这是在讲笑话，但由此可了解到闽南商人经营敏锐之一斑。西班牙商船队长卡里略（Don Hieronimo de Carrillo）在致西班牙国王的信中亦写道：“中国商人在商业上是如此精明，如此敏锐，以致于他们知道英国人需要多少商品，荷兰人需要多少，在日本可以卖多少货物。他们是如此准确，以致于一位裁缝一旦见到一个人，就知道这个人做衣服需要多少布。他们就是如此对付我们，当知道每年只有两艘船到新埃斯帕纳（Nueva Espana）时，他们一般在其居留地‘八连’（Parian）就会有足够的货物装运这两艘船。”[21]

第三，闽南人具有坚韧不拔、勤劳节俭的品质。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不少到菲律宾贸易的闽南人出于种种原因，流寓在菲律宾。当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在奏疏中写道：“东西二洋，商人有因风涛不齐，压冬未回者，其在吕宋尤多。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往，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22]顾炎武也说过：“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或折关破产及犯压各境不得归，流寓土夷，筑庐舍，操庸贾杂作为生活，或娶妇长子孙者有之，人口以数万计。”[23]另据当时驻马尼拉的西班牙代理商蒙法尔康（Gran y Monfalcon）在1636年声称，留居在菲律宾的华人总数已达3万人[24]。这些留居菲律宾的闽南人主要从事的是经商。有关他们在商业上成功的原因，菲律宾学者阿利普（Eufonio M. Alip）在《菲律宾政治文化史》一书中分析道：“中国商人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他们分为两个集团：一个经营市场和商行，售卖纺织品、丝绸、人造丝织物、棉布、毛织品、帽子、雨伞、亚麻布等，有批发商和零售商；另一个是小店主，售卖各种便宜的物品。开始时，西班牙商人还能成功地与华人竞争，但是很快就败给精明、节俭、坚韧不拔的华人。因为华人的生活水平低，他们总是把售价压得比竞争对手低。他们在其他方面，如农业和工业的优势亦很明显。”[25]

另一位学者利奥（Shubert S. C. Liao）也同样认为，勤劳与坚韧是留居菲律宾的闽南人经商成功的关键。他写道：“分散在各地的华人商店，早上开得很早，而晚上关得很迟，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而赚得不多。但是，中国商人满足于他们每天的收入，他们来到这个国家的目的纯粹是为了经商，他们具有各种特质，即坚韧，善思考，有同情心，精明，节俭，而与他们竞争的当地土著和西班牙人就缺乏这些特质。”[26]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西班牙人具有什么特质，萨拉扎（Domingo de Salazar）主教这样写道，每一位西班牙人，尽管他在西班牙可能是个乞丐，但一来到菲律宾，就想成为“绅士”。一般的西班牙人都“不愿意工作”，而是想别人为他服务，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愿意成为劳动者，他们只

知道经营富有的中国 - 马尼拉 - 阿卡普尔科贸易, 即使西班牙士兵也玩忽职守, 追求这种贸易的利润 [27]。由此可见, 闽南人在菲律宾经商成功的关键, 取决于他们与当地土著及西班牙殖民者之间本质上的文化差异。从这种意义上说来, 月港开禁后私人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 靠的也是闽南人所特有的海洋文化特质。

三

月港崛起成为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从本质上看, 并不是顺应当时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迫切要求开拓海外市场的需要, 而是明朝政府为缓解因海禁造成走私问题严重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因此, 即使海外贸易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地发展, 但对整个明朝社会经济的变化却没有带来多大影响, 故至天启末年, 月港即走向衰落, 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 [28]

月港的兴盛既然与闽南独特的海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那么, 月港的衰落亦与闽南文化的负面影响分不开。就以出洋贸易来说, 由于冒险性大, 故拥有较大资产的船主、富商都不愿意下海, 而是豢养一些弃儿, 长使通番, 自己却在家里坐收巨利。这种习俗, 当时在海澄一带非常普遍, 如何乔远所述: “海澄有番舶之饶, 行者入海, 居者附赘, 或得窆子弃儿, 养如所出, 长使通夷, 其存亡无所患苦, 犀象、瑇瑁、胡椒、苏木、沉檀之属, 麇然而至。” [29] 这些养子与其主人之间尚带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简言之, 是这些船主、富商豢养的经商奴隶。这种文化习俗显然保留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另有的船主、富商把钱贷给穷人出洋做买卖, 这种现象在同安亦有出现, 如洪朝选在嘉靖年间写道: “今虽山居谷汲, 闻风争至, 农田之夫, 辍耒不耕, 贷子母钱往市者, 握筹而算, 可坐致富也。” [30] 在海澄这种人数多达数万人, 据《(崇祯)海澄县志》记载: “盖舶主而下, 多财善贾者无不胜数人, 间有凭子母钱称贷数金, 辄附众远行者, 又有不持片钱, 空手应募得值以行者, 岁不下数万人。” [31]

这些靠借贷子母钱出洋做买卖的闽南商人, 在海外普遍存在有资金缺乏的问题, 故很难与西方商人竞争。而且为了避免借贷的利息超期加重, 他们必须赶在季风期返航, 否则一错过季风期, 在海外压冬一年的利息将使他们无法承受。因此, 时间对他们极其宝贵, 即使是无利可赚, 也必须尽快把货物脱手。1615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督燕·彼得逊·昆 (Jan Pietersz. Coen) 就写信告诉十七人委员会说: “到万丹 (Bantan) 贸易的中国船上的人们, 售卖的丝绸比我们的好, 在市场上的卖价比我们货单上开的便宜三分之一, 因为对他们来说, 时间和需要就是法律……由于我们和英国人今年都缺乏现钱, 故中国人离开时手上还留下大量的普通丝绸, 如果我们给予现钱, 有可能比去年便宜 100%, 而瓷器则更便宜……” [32] 在暹罗, 由这些中国船贩运去的瓷器也由于卖价太低, 而使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迷惑不解, 认为 “除非他们在中国买这些瓷器确实非常便宜, 否则他们将无钱还本”, “我们无法想象, 他们的利润是从那里来的, 除了他们懂得如何把回航货物在国内卖高价。” [33] 在马尼拉, 这些闽南商人虽然可获得较高的利润, 但这些利润并不是实际贩运货物所得, 而是赚取两国之间的白银差价。据说当时白银在中国与在欧洲、墨西哥的差价很大, 如 1560 年, 欧洲的金银比价是 1 : 11, 墨西哥是 1 : 13, 而中国仅 1 : 4。于是, 把墨西哥白银运入中国, 即可提高 3 倍价值, 也就是比在西班牙或墨西哥多购买 3 倍的货物。因此, 拉斐尔·伯纳尔 (Rafael Bernal) 在《马尼拉华人居留地》一文中就指出: “中国人在马尼拉贸易的利润, 不依赖于降低中国货物的售价, 而是白银在中国的价格高。换言之, 中国人没有降低自己的价格来与西班牙人、菲律宾人或墨西哥人竞争, 他们按自己的价格售卖而换回白银, 白银在西班牙

的价值远比在中国低得多。”[34]这些情况的存在,使当时到海外贸易的闽南商人,不可能把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竞争的真正信息反馈回来,更不可能花本钱去不断改进商品的质量以赢得在海外市场的竞争。故这种贸易即使发展到一定高度,也不可能对国内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起到多少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却造成闽南一带手工业生产质量不断下降,假冒伪劣产品增多,如当时泉州籍官员李廷机所说:“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什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35]

此外,由于出洋经商的风险特别高,大起大落,随时都在凌鹗破浪,与天吴九首搏命,故在闽南文化中又具有悍强、易讼难治的一面。如蒋孟育在《赠姚海澄奏续序》中写道:“以海市为业,得则潮涌,失则沕散。不利则轻弃其父母妻子,安为夷鬼;利则倚钱作势,以讼为威,至罔常难治也。”吕旻在《新建海澄县城碑记》中也写道:“顾其地滨海,潮汐吐纳,夷艘鳞集,游业奇民,捐生竞利,灭没风涛间。少牴牾辄按剑相视,剽悍成俗,莫可禁遏,当道者忧之。”[36]这种玩命的文化习俗使海商们不可能把赢得的财富转化为资本,投入再生产,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用来铺张浪费,争相夸耀。据《海澄县志》记载,当时的民俗是“平民婚嫁相夸耀以侈张,盖古乐祁从如云,服饰炫熿拟都卿相尚,且未厌厥心,妻谄姻诟竭蹶经营,如输公课。”[37]与海澄相邻的同安,民俗也是极其奢华,“服食华美,奴隶之辈与缙绅等,及今而商贾、胥役之徒,美服食,仆妾舆马,置良田好宅,履丝曳缟,掷雉呼卢以相夸耀,比比而然。”[38]有的村庄甚至发展到不事耕织,专靠海外牟利为生,如漳州诏安县之梅岭,“此村有林、田、傅三大姓,共一千余家。男不耕作而食必梁肉,女不蚕桑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之。”[39]这种文化习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海商资本不能继续积累,手工业生产难以进一步发展,于是月港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优势已丧失殆尽,加之荷兰殖民者的骚扰,以及明朝政府的频繁海禁,月港遂转向萧条,至崇祯五年(1632年)已基本处于关闭状态。

综上所述,闽南因地处海滨,人们以贩海为生,久而成为习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海洋文化。在明朝厉行海禁时,因生路受阻,不少闽南人冒杀头之险,出洋经营走私贸易。明朝政府生怕由此引起动乱,危及其封建统治,不得不于隆庆元年(1567年)宣布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开放海禁,准许私人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出洋贸易。于是,闽南人凭借其善于航海,勇于冒险,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坚韧不拔,勤劳节俭等文化特质,使开禁后的海外贸易迅速地发展起来。然而,当海外贸易发展到一定高度时,闽南文化中的一些不良倾向亦开始暴露出来,如借高利贷出洋经商成风,剽悍好斗,赢利后不继续扩大资金经营,而是挥霍浪费,争相夸耀,甚而不事耕织,游手好闲等,以致于对海外贸易的继续发展带来不良的负面影响,月港亦由盛转入凋零,经历了短暂的65年之后,则匆匆地退出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 [1] 明世宗实录:卷321,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Z].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2] 明世宗实录:卷293,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乙酉[Z].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3] 明神宗实录:489,万历四十年八月丁卯[Z].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
- [4] 冯璋.通番船议[Z].明经世文编:卷280,冯养虚集[Z].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 陈键.(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土志·风俗考[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 [6] 朱纨.暨余杂集:卷3,章疏二[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Z].济南:齐鲁书社,1997.
- [7]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8]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4,福建事宜[M].济南:齐鲁书社,1996.
- [9] 谭纶.善后六事疏[Z].明经世文编:卷322,谭襄敏公奏疏[Z].北京:中华书局,1967.
- [10] 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1] 萧基. 恤商厘弊十三事 [Z]. 东西洋考: 卷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137.
- [12][13] 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M],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59, pp.71-72.
- [14] 赵文华. 嘉靖平倭之役纪略: 卷3, 条陈海防疏. 扬州: 扬州古旧书店, 1959.
- [15] 陈侃. 使琉球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6] 何乔远. 闽书: 卷38, 风俗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 [17] 姚士麟. 见只编: 卷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8] 王云. 闽游纪略 [M].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第九帙. 台北: 学生书局, 1975.
- [19] 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M],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59, pp.72-73.
- [20] 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M],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59, p.74.
- [21] E. H. Blair and J. A.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39—1898 [M], Cleveland, 1903, vol. 29, p.79.
- [22] 许孚远. 疏通海禁疏 [Z]. 明经世文编: 卷400, 敬和堂集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7.
- [23]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 卷93, 福建三·洋税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 [24] Alfonso Felix, Jr. edited,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M],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6, vol. 1, p.47.
- [25] Eufonio M. Alip,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M], Manila, Alip & Sons, Inc., 1954, p. 298.
- [26] Shubert S. C. Liao edited,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Culture and Economy [M], Manila, S. N., 1964, p.31.
- [27] Jim Haskins edited,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M], Manila, Grolier International, pp.48-49.
- [28] 李金明. 十六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漳州月港的崛起 [J]. 南洋问题研究, 1999, (4).
- [29] 何乔远. 闽书: 卷38, 风俗志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 [30] 洪朝选. 洪芳洲先生文集·摘稿: 卷4, 瓶台谭侯平寇碑 [M]. 香港: 华星出版社, 2002.
- [31] 梁兆阳. (崇祯)海澄县志: 卷5, 赋役志二·饷税考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 [32] J. 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M], Bandung, W. van Hoeve Ltd-The Hague, 1955, p.218.
- [33] 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M], Leiden, E. J. Brill, 1954, pp.85-86.
- [34] Alfonso Felix, Jr. edited,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M], 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6, vol.1, p.65.
- [35] 李廷机. 报徐石楼 [Z]. 明经世文编: 卷460, 李文节公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7.
- [36] 梁兆阳. (崇祯)海澄县志: 卷17, 艺文志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 [37] 陈鏊. (乾隆)海澄县志: 卷21, 艺文志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 [38] 怀荫布. 泉州府志: 卷20, 风俗·同安县 [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0.
- [39] 俞大猷. 正气堂集: 卷2, 呈福建军门秋厓朱公揭 [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责任编辑: 廖大珂]